

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 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 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

陳 相 因**

摘 要

本文回溯〈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背景，連結柯倫泰的政治命運，來探究此文本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的傳播機制與翻譯考量，呈現出當中個人與黨團、政治與文學交互作用的複雜關係。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文本的脈絡，並分析柯倫泰的烏托邦理想，在未來蘇聯家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的一年期計畫「女體與國體的現代性建構：中國與俄蘇小說比較，1900-1937」的初步成果之一，計畫編號為99-2410-H-001-099。部分內容以〈初探家庭、公有制與共產政府起源：以柯倫泰《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與傳播為例〉為題，發表於「中文書寫典範的追尋」哈佛人文學者訪問研究成果工作坊（2011年4月8日）。特此感謝王德威教授對本文提出的啟發性意見，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和修改建議。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助研究員

庭、公有制與共產政府下「新婦女」所應呈現的自我形象。第二部分著重探討此文本經過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挑選，藉由中國共產黨黨員介紹，在進入五四時期中國後，如何被翻譯、認識與推廣的機制與過程。藉由追溯與探索這些機制及過程來審視共產主義，從新俄羅斯、蘇聯到中國，是如何利用宣傳與操作「女性問題」達到霸權、父權與政治功利等目的。第三部份則由批判霸權與父權的視角切換為檢驗馬克思女性主義的實踐，柯倫泰和〈家庭與共產政府〉做為一個代表例子，說明這種女性主義與霸／父權主義既對抗又共謀的現象。

關鍵詞：中蘇共黨宣傳、新婦女、家庭與共產政府、未來社會之家庭、柯倫泰、茅盾

一、前 言

1923 年底，中國共產黨上海地區執行委員會委員沈雁冰（茅盾，1896-1981），翻譯了一篇具有強烈政治性的共產主義論文〈未來社會之家庭〉，原作者為蘇聯成立初期最著名的女革命家、政治家、小說家與馬克思女性主義者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這篇作品最初的原型，是柯倫泰為了 1918 年 11 月 16 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一屆全俄羅斯工農婦女代表大會」上所做的一次重要演講。原題目為「家庭與共產政府」（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柯倫泰在演說中呈現她對蘇聯未來家庭規劃的藍圖。會後不久，這篇演說被印製成宣傳小冊子，俄國勞農婦女幾乎人手一冊。¹ 接下來的兩年內，這一小冊子除了由新俄羅斯各地的官方出版社多次再版之外，並改標題為〈家庭與共產主義〉（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在 1920 年發表於官方刊物《女共產黨

1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7.

員》(Коммунистка)，² 更被譯為英、德、法與西班牙文傳播於世，由是廣為人知。³

茅盾翻譯的這篇文章可能是柯倫泰最早傳入中國的作品，收入由東方雜誌社編纂的東方文庫第二十九號《家庭與婚姻》。⁴ 組成該書的另一篇論文〈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則學術性較強，作者為中國知名教育家陳鶴琴(1892-1982)。儘管文章屬性不同，但兩篇論文不論是究其標題名稱，抑或當中指涉之主題、內容與結論，皆能順應五四潮流的精神與目的——喚醒與啓蒙讀者（設定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掙脫傳統家庭制度與婚姻的牢籠，並追求個人自主與自由。

柯倫泰的〈未來社會之家庭〉之所以能於五四運動開始後五年間被介紹到中國來，同時期中則未得見柯氏其他作品的中文翻譯，箇中因素自然包括當時翻譯者的選擇與出版商的考量。誠如歷史學家指出的現象，五四運動初期的大規模學生與群眾愛國運動，使得那些有機會到學校唸書的女學生們不僅是步出校門而已，還從傳統婚姻與舊制家庭中出走（或逃走）。⁵ 一時之間，「娜拉出走」的口號、主題、實例與事件充斥於報章雜誌等主媒體，吸引大眾輿論注意，並引發知識分子紛紛撰文討論。⁶ 從這一研究提供的案例中不難發現，討論娜拉為何出走的多

2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 *Коммунистка*, 7 (1920), С. 16-19.

3 目前找到的 1918 至 1921 年間俄、英、德、法與西班牙文的版本如下：*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осква: Коммунист, 1918; Самара: ВСИК, 1919; Харьков, 1920;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1920).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London: The Workers' Socialist Federation, 1918). “Die Familie und der Kommunistische Staat,” *Sowjet* (Vienna), 8/9, 10/11 (1920). *La famille et l'Etat communiste* (Paris: Bib. Communiste, 1920; Brussels: Ed. communiste, 1921). “La famiglia e lo Statocomunista,” *Communismo; Rivista della III Internazionale, 1919-20*, pp. 617-630. 二〇年代過後出現的更多版本與研究可參閱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3-324.

4 [俄國] Alexandra Kollontay 著，沈雁冰譯，〈未來社會之家庭〉，收入東方雜誌社編，《家庭與婚姻》（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 1-22。

5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頁 191-198。

6 許慧琦的研究提供不少報章雜誌上的實例、事件與後續的輿論與評論。例如，1919

數批評文章裡，中國傳統制度下的婚姻、家庭與社會重複地被描寫為「腐敗的」、「黑暗的」、「萬惡的」與「不自由的」等等具有負面意義的形容詞。⁷ 五四時期報刊揭露的接連事例與刊登的陸續批評，衝擊著知識青年的理智，造成集體離家出走的現象，⁸ 但後續卻也為人們帶來諸多的反思詰問：「娜拉走後怎樣？」⁹ 所謂「光明的」、「理想的」與「自由的」家庭與婚姻制度又該是如何？這些相關問題的探索就成了《家庭與婚姻》一書的翻譯與出版動機之一。

在標題的譯文中，茅盾將柯倫泰的「共產政府」或「共產主義」改為「未來社會」，雖能符合原作之意，但更重要的是在某一程度上體現了翻譯者當時身為共黨一員的信念：中國的未來必將與蘇聯一樣步入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未來社會之家庭〉一文勾勒的蘇維埃新婦女生活、婚姻制度、兩性關係與國家保障，承諾了五四知識分子一個有前途的希望，讓人以為烏托邦或桃花源並非僅是紙上談兵、痴人說夢，而是已經在這世界真實存在的一個具體典範，並朝著這樣的理想前進。

然而，若由歷史發展的後見之明來回顧，柯倫泰在〈家庭與共產政府〉中，論述她對未來共產主義專制下家庭與政府各項措施所懷抱的宏大夢想，正如與她同時代的不少男同志，像是列寧、托洛斯基與史達林等人對她的看法，是不切實際且常令人懷疑的。¹⁰ 此文論述所造成的影響與後果，迴響與反應最多的是當時共產黨設定吸收的對象與政治目標

年11月14日的趙五貞自殺事件與社會評論，以及1920年2月李欣淑出走的案例與其影響等研究。更多例子與其細節可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189-286。

- 7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189-286。
- 8 不少研究者皆指出這一五四現象。可參見葉嘉熾，〈五四與學運〉，收入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43-45；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95；龐樸，〈繼承「五四」超越「五四」〉，收入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頁123-128。
- 9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冊1，頁165-173。
- 10 列寧、托洛斯基與史達林對柯倫泰本人私生活，以及她在婦女問題與公共政策的意見，當中包括〈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看法，已有專書研究，參見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76-77, 165-172。更多細節亦可見於下文。

——不論是對十月革命前後與「國內戰爭」的俄羅斯、抑或是五四時期的中國，甚至是全世界的青年男女——達到了最佳宣傳效果。後來的史實證明，這一華而不實的論述不僅引發想像與啓蒙教育，更使廣大的青年與知識分子投入共產革命的行列。然而，這些理想最終在革命後的共產家庭與社會中並未完全真正落實。在諸多共產國際的絕密文件與共產黨員的回憶錄尚未公諸於世以前，絕少的五四時期翻譯者與研究者，更遑論當時的一般大眾，能夠得知而明瞭：柯倫泰的文本從在蘇聯的生成背景開始，直到被選擇做為輸入中國成為翻譯本的過程中，其實蘊藏著不少政治因素的考量，且暗夾著諸多宣傳的操弄。「婦女」的身分與「婦女問題」的相關議題，在這些政治考量與宣傳的過程中，最終成了男性領導者利用並達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本文第一部份首先論說蘇聯建國初期柯倫泰的政治命運，繼之回溯〈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背景，並探究前、後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部分亦論述柯倫泰在此文中勾勒的「新婦女」(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藍圖，並分析在未來蘇聯家庭、公有制與共產政府下「新婦女」所呈現的自我形象。第二部分著重探討此文經中國共產黨黨員介紹，在進入五四時期中國後，如何被翻譯、認識與推廣的機制與過程。藉由追溯與探索這些機制及過程來審視共產主義如何利用宣傳與操作「女性問題」達到集權、父權與政治功利等目的，並因此在所謂「新俄羅斯」與「五四中國」得以延續、發展與發揚。

二、文本的生成與內容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過後，柯倫泰成為新俄羅斯政府裡的唯一女性且具有最高官階，不但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之一員，選舉票數甚至超越黨齡比她更高的史達林。¹¹ 同年11月，柯倫泰被委以人民委員會 (Совет

11 Leo Trotsky, *Stali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941), pp. 220-221. 柯倫泰的得票數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僅次於列寧、季諾維耶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卡緬涅夫(Лев Каменев, 1883-1936)、托洛斯基(Лев Троцкий, 1879-1940)與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¹² 社會福利部的人民委員(Нарком, 相當於部長) 一職, 成為當年世界政壇的話題之一, 風光一時。但是, 1918年初, 柯倫泰加入由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 1888-1938)領導的左派陣營, 反對列寧簽署與德和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 並且與比她年輕十七歲的海軍部人民委員戴本柯(Павел Дыбенко, 1889-1938)結婚。之後, 伴隨著與這些原因相關的幾個政治事件發生, 使得柯倫泰的政治光環逐漸被削弱。¹³ 這一年的3月18日, 柯倫泰為了抗議列寧與德國簽署和平協議與其新婚丈夫被控叛國罪名, 先後怒辭人民委員與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不久後, 戴本柯雖無罪獲釋, 處於反對陣營的左派領導者也紛紛官復原職, 唯獨柯倫泰依舊被黨中央排除於外, 不授以任何職務。¹⁴ 自此之後, 柯倫泰與列寧在革命前所建立友好而緊密的政治伙伴與朋友關係就再也沒有恢復過。¹⁵

1918年春夏過後, 俄羅斯境內國內戰爭的急遽發展為柯倫泰沉寂多月的政治生涯帶來轉機。秋天起, 前線戰事需要更多後方的女工投入支援, 然而黨中央、女共產黨員、非黨員婦女與工農婦女之間, 卻產生了許多溝通與配合的問題。柯倫泰在革命前後對婦女運動、青年族群的影響力與其演說時的號召力, 再度被中央委員會憶起, 而被賦予承辦「第一屆全俄羅斯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責任, 並作為聯絡女共產黨員、勞農婦女與黨中央之間的溝通橋樑。¹⁶ 為因應此會議的舉行目的以解決當前婦女與國家認同問題, 柯倫泰再度發揮她的演說長才, 〈家庭與共產

諾金(Виктор Ногин, 1878-1924)。

12 1922至1946年間, 蘇聯中央機構部門總稱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 英譯為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of the USSR, 委員會各部部长由最高蘇維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СССР), 也就是黨內首腦所組成。後改為蘇聯首長會(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每四年召開會議。

13 關於這段詳細的歷史與柯倫泰在1918年3月後逐步淡出政壇的原因探討, 可參閱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p.105-126;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22-148.

14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20.

15 Barbara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40.

16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34-137.

政府〉一文由是誕生。此論述的用字遣詞簡潔明瞭，共分三個部分：女性投入勞動生產、停止從事家務事和共產政府育兒政策，不但連結勞動女性的需求與布爾什維克黨亟需女性生產力配合的設定目標，同時也貫穿柯倫泰在 1918 年時寫作的主題——建構「新婦女」的自我形象。

第一部份「女性扮演的生產力角色與其家庭效能」，闡釋歐洲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勞動婦女的現象與其衍生的問題，諸多變化已經開始破壞傳統的父權家庭制度。然而，這些資本主義下的變化雖使傳統家庭崩解，卻更讓婦女肩頭負擔加重。一個資本主義的婦女，在柯倫泰的筆下：

既是妻子、母親還是勞工，得一心三用來扮演著這些角色。她必須像她的丈夫一樣在工廠、印刷場或商場上工作，在這之上她還必須找時間整理家務並照顧小孩。資本主義將壓垮肩頭的擔子加諸在婦女身上：雖使她成為有薪資報酬的工人，卻並不降低她做為家庭主婦或母親的煩惱。婦女在這三重的重擔下顛預而行，苦痛而臉上總是掛滿淚水。¹⁷

柯倫泰認為，只有蘇維埃俄羅斯，也就是「勞工的俄羅斯」能夠順應這些變化，並體察資本主義下婦女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柯倫泰首先說明新俄羅斯婦女已經可由蘇維埃制度的合法婚姻程序，保障自身地位，並與男性平等地自由結合與分離，強調「一個婦人的終身之託不在一個男人，而是一個社會、整個國家」。¹⁸

接著在第二部分「家務非義務」裡，柯倫泰娓娓論證舊俄（沙俄）傳統婦女的工作內容與工作量從她們祖母的年代到革命前的轉變。那麼，如何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她建議，家務並非婦女的天職或義務，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可以將個人家務事轉為集體式的管理，給予專職家管的男性或女性來承擔。此外，蘇維埃社會設置公共的餐廳、咖啡館與洗衣

17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 С. 17. 本論文的第一部份主要研究柯倫泰在蘇聯，故中文翻譯由筆者參考原文後自行提供。關於茅盾與 1929 年沈端先所翻譯的版本與部分內容，將於本文第二部分柯倫泰在中國探討。若有其他版本則另注。

18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 С. 16.

店等設備，用以解決勞動婦女的問題，女性可不再為瑣碎的雜務所苦。¹⁹演講的最後部分提出兒童教育與撫育的責任在於國家，藉此以減輕勞動婦女肩上的重擔。柯倫泰詳列她在社會福利部時具體實施的政策與措施，其中包括公共的日間育兒所、幼稚園、小學、醫院與避難所等，並提供免費教科書與衣鞋給國內兒童。這些事實，在在地顯示了教養兒童的責任從私人家庭轉至集體的社會。在這一部份中，柯倫泰同時辯稱，共產社會並非是剝奪父母的子女，更不會削弱母性的權利，因為「共產社會對著勞動男女說」：

你們年輕，你們相愛。每個人有權追求快樂、過想過的生活。
不要逃避快樂。不要懼怕婚姻，即使過去在資本主義下婚姻
著實是痛苦的枷鎖。不要害怕有小孩。社會需要更多勞動者，
並慶賀每一個小孩的誕生。不需顧慮你們小孩的將來，因為
他們將不會知道什麼叫飢餓、什麼叫寒冷。²⁰

依照柯倫泰在這篇演說所述的理想，她單純地以為一旦婦女的生活重心僅剩工作時，那麼過去資本主義下的舊家庭與傳統婚姻所帶來的問題亦將消失、獲得解決。新的共產家庭於焉產生，兩性關係也將與過去全然不同，並取代婦女問題。「正如過去母親對自己兒女的狹義的與獨佔的鍾愛必須擴展成為對所有無產階級子女的大愛(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柯倫泰認為，「新的兩性關係是愛慕之情(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與同志情感(товарищество)的結合，是在勞工國家裡兩個平等的成員因愛與相互尊重的結合。」²¹

〈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作為一例，其內容足以說明柯倫泰辯才無礙，與她具邏輯基礎的理論。同時，也因為這篇演說，使得被黨冷凍的柯倫泰重新回到政治舞臺。「第一屆全俄羅斯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圓滿成功，以及後續影響所帶來重大的組織變革，例如迫使許多工廠的男性領導不得不重視女性勞工的地位和其參與決策的權力，充分地展現了

19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 С. 17-18.

20 “Семья и коммунизм”.

21 Там же, 19.

柯倫泰的群眾魅力與政治能力。在籌組與安排這次會議的過程裡，柯倫泰上下逢源且合縱連橫，穿梭於黨團與民間團體間，顯示了她長袖善舞的外交手腕與溝通能力。²² 面對下層共黨與非共黨的工農婦女代表，柯倫泰以政治標語「透過實際參與蘇維埃建設邁向共產主義」²³ 來強調女性自覺和解放的重要性，並主張女性投入工作不僅在於保衛國家，更是為了自身的自由而奮鬥。²⁴ 就在會議結束時，工農婦女代表們達成以下共識：女性不但可以像男性一樣做任何事情，還更應該積極參與建設蘇維埃共產主義日常生活每一面向的大小事務。²⁵ 懷著這樣的意識與共識，回到工廠的萬名婦女代表開始對工廠組織幹部施壓，改組工會使婦女亦有機會成為幹部，參與建設工作。一時之間新的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迫使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正視婦女問題而尋求她們的認同。會議過後，柯倫泰以「婦女工盟中央委員會」²⁶ 代表的身分，出席了 1919 年 3 月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儘管會中柯倫泰不少

22 舉辦這次會議的過程事實上並不順利，當中柯倫泰得調節來自婦女團體內部派別的鬥爭與不同意見，還得面對她自己尷尬的身分問題；從 1918 年初開始籌劃時她還是社會福利部部長與中央委員會委員，但在會議舉辦期間她早已不具任何官方身分。另外，柯倫泰也必須彌平共產黨黨內的男性領導們（包括列寧）的質疑，說服他們舉辦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還有，會議舉辦時是在國內戰爭開打的期間，糧食與日常生活等外在條件普遍匱乏，如何聯絡與安排來自全國各地的工農婦女齊聚莫斯科的食、住、行等等事宜，都成了柯倫泰必須解決的問題。〈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形成、舉辦「第一屆全俄羅斯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過程與其內外處境的困難，可詳見 Beatrice Farnsworth, “Kollontai,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in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27-172.

23 А. Коллонтай, “Как мы созвали Перв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рабоник и крестьянок,” *Коммунистка*, 11 (Ноябрь 1923), С. 5.

24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55.

25 А. М. Иткина,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Трибун, Дипломат: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Александры Михайловны Коллонта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 197. 對此次代表大會過程和內容簡明或詳盡的介紹，可參閱 Richard Stites, “Zhenotdel: Bolshevism and Russian Women, 1917-1930,” *Russian History* 3, part 2 (1976), pp. 176-178;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49-177;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37-164.

26 英譯 Central Commission for Work among Women，此委員會與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相結合。

的政治動作引起了一些爭論風波，²⁷ 但布爾什維克黨的高層卻不得不承認，柯倫泰的努力確實使黨達到動員工農婦女來幫助戰爭的目的。柯倫泰這篇演說所提供的共產社會藍圖，即使以 21 世紀初期的觀點來審視，其政治視野仍舊不失前瞻性與前衛性。由此想見，當年這篇演說與後來的宣傳小冊子發表時，為蘇聯、甚至是世界各國婦女所帶來的震撼性，以及它所具有鼓動人心的煽動性。

三、文本的選擇、傳播與翻譯

身為〈家庭與共產政府〉的翻譯者，茅盾或許並不清楚 1918 至 1919 年間柯倫泰在蘇俄的處境與文本的背景。但對他而言，柯倫泰這篇文章除了既順應五四時勢又能符合自己的看法外，更重要的還有能夠配合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這也映照出翻譯本在中國的歷史背景。在這篇中文翻譯出版之前，同年的 2 月，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參與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一度曾使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部分高層誤以為，中國的工人運動高漲使革命階段臻於成熟。²⁸ 但是，隨著「二七大罷工」而來的「二七慘案」，中共

27 可參閱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60-161;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p. 168-172.

28 中國工人階級在不久的將來會取得領導地位的看法，在 1922 年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共產主義與革命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已有明確的表示。代表大會當時雖然沒有立即接受這一觀點，但隨後卻明顯地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京漢鐵路工人的罷工，就是響應這個宣言的一個顯著例子。參閱郭恒鈺引用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與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薩法洛夫在會中報告，以及其後續發展所做的研究與分析，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36-42。這一觀點亦可見於 1923 年 4 月 4 日〈共產國際東方部就 1923 年第一季度的工作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報告〉，“№ 71: Из доклада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Президиума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о работе в первом квартале 1923 г.,”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4), под руковод. Го Хэньюй и М. Л. Титарко, Т. I, 1920-1925, С. 217。中文譯本可參閱〈第 71 號絕密文件〉，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

黨員死傷慘重使得華北與華中地區的黨員招募產生困難。因此，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寫信給薩法洛夫(Г. И. Сафаров, 1891-1942)，闡釋建立革命隊伍必須打出國民革命而非共產主義的旗幟。²⁹ 同年底，孫中山派遣以蔣中正為首的赴蘇國民黨代表團回到中國，加速了國民黨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實際合作的腳步。³⁰ 上述這些政治觀點與動作儘管已經埋下了四年後中共八七會議鬥爭的種子，卻或多或少反映且落實於這一時期共產黨員的寫作、翻譯與出版的策略；這也是為什麼矛盾的這篇翻譯會與國民黨政治立場較為接近的陳鶴琴的論文，被編輯為一書，並收入於倡導新知且黨派色彩較不鮮明的東方文庫叢書中。

柯倫泰這篇〈家庭與共產政府〉是否在茅盾翻譯之前，便已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所知呢？答案是肯定的。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與布爾什維克黨及共產國際之間經常利用電報或書信往返緊密地聯繫，並互通宣傳口號與物品等的消息，中國共產黨本身為利用聚會或會議等形式

卷1(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196。下方引述此書時,筆者斟酌原文脈絡而修改中文翻譯,故與李玉貞的版本有些出入。

29 “№ 78: Письмо Чэнь Дусю Г. И. Сафарову,”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д руковод. Го Хэньюй и М. Л. Титарко, Т. I, 1920-1925, С. 236. 〈第78號文件〉,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卷1,頁215。

30 國共兩黨在俄商討具體合作的會議記錄,可參閱“Миссия Гоминьдана в Москву,”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4), под руковод. Го Хэньюй и М. Л. Титарко, Т. I, 1920-1925, С. 243-314. 中文翻譯可參閱〈第三編:孫逸仙博士考察團在莫斯科〉從82號至100號文件,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卷1,頁232-296。儘管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具體辦法是在廣州磋商而成,加上蔣介石訪問團的主要任務是希望蘇聯能夠實現援助孫中山提出的西北軍事計畫,然而訪問團的主要目的更在於「渴望瞭解紅軍是怎樣組織軍事和政治工作的」,且「盡可能多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接觸」,並加以借鑑與學習,見頁225。雙方代表的蔣介石和魯祖塔克兩人皆認為,「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本質接近」(頁226),所以這批文件(82號至100號)也詳細地討論了俄共(布)紅軍如何與國民黨軍隊合作的具體方式。雖然雙方在軍事合作計畫上的細節意見各有分歧,但是展現出必須相互合作的態度之堅與速度之快已十分清楚。

來傳達俄國的指令與訊息。³¹ 1922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達成幾點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其中第一點便開宗明義地挪借柯倫泰在此文中稱頌的宣傳重點：只有蘇維埃俄羅斯能使世界的婦女得到解放的地位。而柯倫泰所列舉共產主義特別為婦女所安置，如公共食堂、洗衣店與兒童養育院等等，她所建議有助於婦女追求解放與平等的措施，也都在決議中一一被提及。³² 同時，因應婦女運動逐年高漲的需求，茅盾在黨中央不反對與非共黨人士合作的情況下進行宣傳，偕同周作人、周建仁、胡愈之、夏丏尊與章錫琛等人組成「婦女問題研究會」，³³ 以具體翻譯或創作的方式爭取輿論注意，譬如這篇〈家庭與共產政府〉的翻譯，或者是以章錫琛為首的《婦女雜誌》編輯群在1920年代所發動「戀愛與新性道德」論爭等等事例，³⁴ 皆為鼓吹並希望能實踐他們所訴求的婦女自由與平等的決議與口號。可以說，從1920年的後六年內期間，中國共產黨注重的焦點正是宣傳，而柯倫泰的政見就是黨的文宣品之一。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婦女問題研究會」成立的目的是在於宣傳柯倫泰的政見，而是說明了在1920年代這一波「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中，〈家庭與共產政府〉順應此一潮流得以與陳鶴琴的文章一同出版，實有天時、地利與人和等外在條件的幫助。

在1918年的期間，柯倫泰修改了下列三篇論文——〈新婦女〉、³⁵〈戀

31 見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 I, 1920-1925, 或《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一書。

32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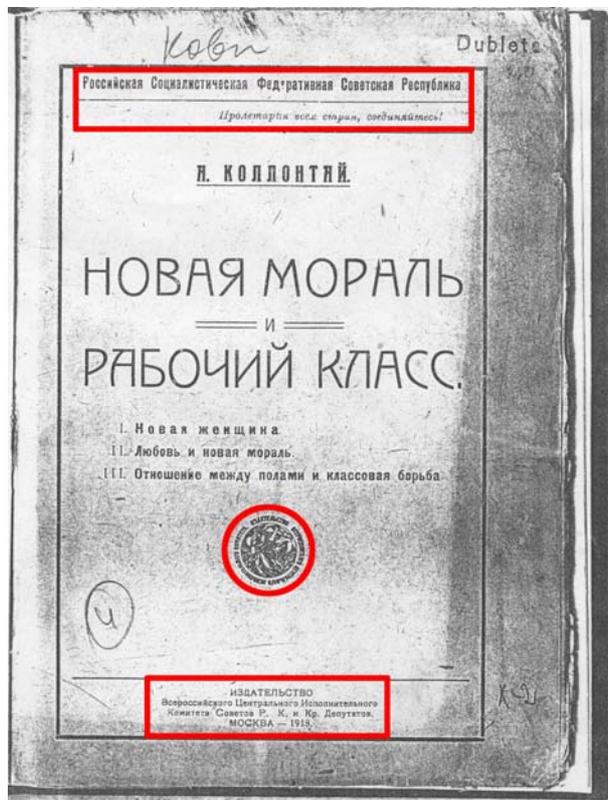
33 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簡章以及發起人等資料，可詳見〈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及簡章〉，《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頁55-57。

34 關於這些事例的研究汗牛充棟。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一刊為例，當中不少論文涉及這些事例。譬如，可參見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期3(1995年8月)，頁77-95。「婦女雜誌專號」，期12(2004年12月)。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期16(2008年12月)，頁29-92。

35 原文為“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最早的版本出現在雜誌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 9 (1913), С. 151-185。

愛與新道德》³⁶ 與〈兩性關係與階級鬥爭〉³⁷——並將之收入由全俄羅斯中央委員會執行處出版的《新道德與勞動階級》(Новая мораль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書皮封面上方附有蘇俄國家格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正是作為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正式文宣品的慣有編排方式(見附圖一)，此列為當年的國家教科書。

附圖一



36 “Любовь и новая мораль”，最早的版本刊於雜誌 *Новая жизнь*，№ 8 (1911)，С. 174-96，原作標題為〈舊題新論〉(На старую тему)。

37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полами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最早的版本刊於雜誌 *Новая жизнь*，№ 9 (1911)，С. 155-82，原作標題為〈性道德與社會鬥爭〉(Половая мораль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борьба)。

然而，繼矛盾的中文翻譯之後至 1927 年的清共與分共之前，也就是共產黨黨員紛紛接獲指示加入國民黨的期間，³⁸ 需在國民黨的旗幟下招募共產黨黨員，沒有黨員數量匱乏的急迫性問題時，柯倫泰的作品隨之銷聲匿跡。弔詭的是，從一開始到 1927 年這段期間內，《新道德與勞動階級》與〈家庭與共產政府〉這兩本布爾什維克黨的教科書並未獲得中國翻譯者的青睞與注意。令人不禁產生疑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矛盾選擇了柯倫泰的〈家庭與共產政府〉，卻對《新道德與勞動階級》此本更能代表柯倫泰思想的教科書視而不見？

在思考文本自身的內在原因之前，讓我們先聚焦於外在管道的建立，思考柯倫泰最早的文本是透過何種機制傳至中國。早在 1920 年時，布爾什維克黨派黨員與情報分子前往上海，設立的第一個組織為「革命委員會」。委員會底下共設置三個部門，分別為出版(издательская)、情資（或可譯為情報鼓動、情資煽動，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гитационная）與組織(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部門。³⁹ 出版部門下設印刷廠，使委員會可自行印製宣傳小冊子。小冊子、報紙、海報或俄共領導人如列寧、托洛斯基等人的照片等宣傳物品，主要由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挑選。⁴⁰ 在中央委員會尚未設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之前，這些文宣品是經由設置於伊爾庫茨克、海參威、哈爾濱與布拉戈維申斯克等地的遠東局，以分別獨立作業的方式投遞給那些中國、朝鮮和日本較為接近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活動家與共產黨員。⁴¹ 其後為加強對東亞各國的管理與控

38 矛盾甚至在 1925 年 11 月時，接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部部長。

39 “№ 2: Письмо Г. Н. Войтинского в секцию восто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при Сиббюро ЦК РКП(б),”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С. 30.

40 “№ 2: Письмо Г. Н. Войтинского в секцию восто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при Сиббюро ЦК РКП(б),”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С. 30.

41 “№ 8: Из доклада Исполкому Коминтерна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екции восточных народов при Сиббюро ЦК Р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1920-1925, С. 48-55.〈第八號文件：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國

制，在中央委員會下設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並在 1921 年 1 月建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使各國有直接管道回報給在莫斯科的總部。這些機構的設置與傳播途徑和管道意味著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在同一時間內透過信使、郵寄與電報等方式，中、日與朝鮮三國極可能接收來自黨中央的同一批文宣品，然後續而在各國進行下一步翻譯、印刷與宣傳的工作。

如前所述，1918 年對柯倫泰而言，是經歷諸多政治危機的一年。儘管仍具共黨代表資格與開國元老的身分地位，柯倫泰在中央委員會的實權已然隨著她的辭呈而被剝奪。正如方斯沃史(Farnsworth)指出，儘管中央委員會執行處出版了《新道德與勞動階級》，但是主要握有政治與軍事權力的列寧和托洛斯基，甚至是其他多數的布爾什克黨黨員，對於此書內容的觀點與它對黨內青年階層的強烈影響力，事實上卻是懷著懷疑、反對和懼怕的心理。⁴² 在革命階段時，多數黨員與托洛斯基的意見一致，吸取恩格斯的理論，傾向認為只要藉由革命解決所有外在經濟條件的問題後，「男女真正的平等就會到來，兩性關係將憑藉著相互的愛慕，而獲得家庭與個人內在的穩定性。」⁴³ 然而在《新道德與勞動階級》中，柯倫泰卻比其它的黨員更早地認清與面對恩格斯沒有看見的事實：從經濟層面考量與家庭責任中解放出來的婚姻，仍可能在愛情產生且對伴侶不再有物質需要後，失去它的穩定性。⁴⁴ 故對柯倫泰而言，未來家庭的組合基礎可能是在於心靈的親密關係，也可以是短暫或一時的，是受激情所驅或與肉體吸引而結合。在《新道德與勞動階級》鼓動的這種論調，觸怒了黨與那些陽奉陰違的黨員——儘管在私生活領域中遵照著柯倫泰所謂性自由的「新道德」，卻在公共領域裡拒絕承認。然而，柯倫泰立意創造的「新婦女」形象，並在〈兩性關係與階級鬥爭〉直陳中

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頁 27-34。

42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65.

43 Л. Троцкий, *Вопросы быта* (Москва, 1923), С. 45. 關於多數黨黨員與托洛斯基吸收恩格斯的觀點，認為解決了物質上附屬關係的衍生問題後，家庭、兩性與婦女問題就自然迎刃而解。參見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65.

44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65.

產階級發展的性危機入侵勞動階級，但黨卻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的觀點作為藉口，或者是中產階級裡男性佔有女性與兩性不平等的意識型態作崇，忽略這一重要的現象。

柯倫泰對黨與黨員技巧性的（論述中用字遣詞多使用「我們」而非「黨」）強烈批判，自然招致黨內批評並引發爭議。在1918年夏至1919年春的期間，柯倫泰只能孤軍奮戰地以創作和演講來抒發己見。然而，《新道德與勞動階級》這本教科書得以出版的事實間接地暗示，革命後列寧在多數黨中雖享有崇高的地位與聲譽，但接連地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戰爭與黨內挑戰，權力並不全然鞏固。如前所述，黨仍須藉助柯倫泰做為宣傳者的風采與鼓動者的力量，來吸引青年男女的投入。但是，1923年後蘇俄國內政治態勢逐漸明朗，紅白之爭高下已判。若明白《新道德與勞動階級》這本帶有先進思想與先鋒角色的教科書在1918年曾經引起的黨內爭議，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它在遴選宣傳品的機制中可能被刻意地遺忘，阻礙了它在1920年至1927年前進中國的道路。根據現有資料顯示，這本教科書在日本與中國的初版翻譯皆出現在1927年後，尤其是當以上兩國大量的共產黨黨員被搜捕與追殺之後，柯倫泰的名字方才廣為兩國的知識分子所知。⁴⁵

45 關於日本方面，根據日本學者杉山秀子的研究，在日本最初對柯倫泰有比較完整的介紹是1924年由山川菊榮在雜誌《女性》十月號（頁290-291），以「柯倫泰女史」為提名發表的文章。這篇關於柯倫泰的論文並未直接觸及她的著作，僅極具善意的介紹其為人。直至1927年後，松尾四郎譯的柯倫泰的《赤戀》與林房雄譯的《戀愛之道》出版後，柯倫泰的著作對日本年輕的知識分子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詳見杉山秀子，《コロンタイと日本》（東京：新樹社，2001），頁147。柯倫泰作為一種主義在1927年後的日本廣受歡迎，成為一種流行現象，甚至使她成為日本年輕人（特別女性運動者）崇拜的政治偶像，可從報刊的介紹文字中看出端倪。舉較著名的報紙《読売新聞》為例，在1927年過後刊載了不少關於柯倫泰本人或其著作出版的新聞。例如，中尾龍夫，〈コロンタイ女史の「赤い戀」〉，《読売新聞》，1927年11月27日，版4。本郷HY生，〈恋愛の道〉，《読売新聞》，1928年5月15日，版4。南十三，〈モダンな愛慾圖：コロンタイの「グレード・ラブ」〉，《読売新聞》，1930年4月12日，版4。秋田雨雀，〈赤い恋のコロンタイ女史：世界的文豪の或日の印象より〉，《読売新聞》，1931年7月15日，版4。這些資料中，秋田雨雀以日本女性運動者之姿，敘述她在蘇聯見到柯倫泰的

《新道德與勞動階級》收入的三篇文章，其主旨、內容與主張有不少部分映照著她的個人生活經驗與經歷，修改的部分也明顯地為自己與戴本柯的處境做強力辯護。1917年春，柯倫泰至赫爾辛基水手軍團演講時認識戴本柯，根據托洛斯基的回憶，11月時黨內就盛傳柯與戴兩人的戀情。⁴⁶ 45歲的柯倫泰與28歲的戴本柯的老少戀，尤其是顛覆傳統男女關係與地位的「不倫戀」，震驚了大部分的布爾什維克黨黨員，儘管這些人在理論上相信自由精神，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過著傳統生活。⁴⁷ 托洛斯基更若有似無地暗示，令黨員無法接受與理解的不只是柯倫泰倡導的性行為自由，還有步入中年的她愛上青年男子的強烈傾向。⁴⁸ 從1916年開始，列寧就認定柯倫泰是施烈普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Шляпников, 1885-1937)的妻子，一位比她小10歲的黨員。誠如一位歷史學者的分析，柯倫泰「身體力行」的三角戀情與「大聲疾呼」的自由性行為鬆動了婚姻的束縛，令列寧感到不快而不安。儘管他可以以哲學思考的方式來看待柯倫泰的「新道德」，更不承認自己如柯倫泰在〈兩性關係與階級鬥爭〉所批判的，對男女有雙重的道德標準，具有封建制度與中產階級的觀點，但是從具體生活的實踐上來看，列寧本身的確就是一個傳統標準的中產階級者。⁴⁹ 在此時，列寧對柯倫泰個人行為的不認同，也可能同時地貶抑她思想的高度水準並損及她在黨中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柯倫泰在1918年時不為黨內的多數人接受並被列寧遺棄的原因之一。⁵⁰

《新道德與勞動階級》中倡導的「自由戀愛」、「戀愛的多角性質」與「自由的性」等主題，體現了柯倫泰「老少戀」、「三角戀」與「不

經過，並對柯氏述說日本女性運動受其啟發良多，還讓柯氏在她筆記本上簽名以公諸於報。用字遣詞雖保有日本人的謙抑有禮，但透露出內心激動與見到偶像時的心情並無差異。在1927年之前，如此頻繁且有系統地介紹柯氏與其著作在日本的報刊雜誌並未得見。

46 L.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ed. and trans. Charles Malamuth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41), pp. 243-244.

47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76.

48 Trotsky, *Stalin*, p. 244.

49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17.

50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 117.

倫戀」(如果挪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用字遣詞)的生活經歷。這些經歷使得柯倫泰更加篤信自己在革命前所提出的假設,現今已經成為具有實踐經驗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因未受過封建制度與中產階級下貴族的教養與知識分子的教育,故若依其直覺與本能來為集體主義的理想工作,以及藉由在自由戀愛中不同靈魂與身體的結合,正可顛覆資本主義與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的道德,然後建立起以無產階級為價值觀體系的新道德。⁵¹ 有趣的是,這些主題隨後進入五四中國(或者是臺灣),柯倫泰與其筆下小說人物的思想、行為與命運,十分巧合地與不少左翼女性的生活模式相符。信手舉例,如向警予、丁玲、白薇與楊之華,甚至是謝雪紅等女共產黨黨員,不論是實際生活,還是筆下創作都顯示,他們或其文本敘述者(通常以第一人稱形式出現)皆曾經驗過「姊弟戀」、「三角戀」或「婚外情」帶來的精神折磨與苦惱。

然而,前述遠非意指著「女大男小的老少戀」、「三角戀」或「不倫戀」的生活現象為柯倫泰首創,而是解釋了柯倫泰將此現象視為在通往女性解放與自由戀愛的道路上可能衍生出的種種問題之一。身為作家的柯氏依循了19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像是《誰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和《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3)等「社會心理小說」(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敘事傳統,分別在她的中短篇小說〈赤戀〉(Василиса Малыгина, 1923)、〈三代之戀〉(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1923)、〈姊妹〉(Сестры, 1923)和〈大愛〉(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1923)裡提出這些社會問題與精神現象,且在小說最後的結局往往未給予解答,留予讀者思考的空間。儘管如此,身為政治家的柯倫泰卻嘗試性地在其政論性質的演講或論文集,例如《新道德與勞動階級》與〈給展翅的愛神一條路吧!——給勞動青年的一封信〉(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 1923)中分析與研究這些問題,希望使其獲得合理化、理論化與政策化的解釋與解決。向警予、丁玲、白薇、楊之華與謝雪紅不一定盡皆讀過或知曉柯倫泰其人其作(這仍須進一步地考證和比

51 A. Коллонтай,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Малых, 1905), С. 12-13.

較對照雙方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因為蘇聯共產黨內具有柯倫泰這號官方的指標性政治人物，以及她所提出的婦女問題、性別理論和其生活實踐，使得這一種不論放在 1920 年代抑或放至今日看來是有苦難言的戀情，比起其他政黨來得更容易吸引本身為這些問題所苦的中國女性（甚至是男性）。向、丁、白、楊與謝氏等人在左翼的風潮與風氣中浸染，接受、認同與仿效柯倫泰典範則成了是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影響問題。

儘管列寧與新政府內大多數的高層官員（黨員）對柯倫泰在《新道德與勞動階級》提出諸多革命性的觀點並不認同，在 1919 年夏天時，中央委員執行會卻再度翻印這本書做為共青團(Комсомол)的教科書，並指名柯倫泰作為中央委員會駐共青團的代表，目的在重整舊青年黨員並號召新青年加入。這一前後矛盾的產生原因無它，正如歷史學者所指，就在於當時在國內戰爭中紅軍節節敗退，眼看在戰爭中就要失敗，需要來自黨內任何可能的援助。學者們續而提出結論，派遣柯倫泰作為中央委員會駐共青團的代表，反映的不是來自高層的信任，而是他們絕望的象徵。⁵²

上述種種史實，在在說明了柯倫泰先進的「新婦女」、「自由戀愛」、「自由性行為」與「無產階級的新道德」等主張，不但不被她的同時代高層官員理解、接受與認可，甚至將她的思想與私生活做為茶餘飯後的流言蜚語消遣。1927 年底到 1928 年初，當史達林逐步清除政敵邁向獨裁專政，而托洛斯基等反對派面臨流放的命運之際，柯倫泰至此的全部創作，包括上述在 1923、1924 年間廣受青年喜愛的流行小說，在 1927 年後的史達林時期已不見任何的再版。弔詭的是，直至 1960、70 年代英美激進主義與女性主義(radicalism and feminism)的革命號角響起之際，塵封多年的柯倫泰著作再度地被西方拱出、擦亮與偶像化(idolized)，為此蘇聯官方出版社「紅色無產階級」(Красный пролетарий)卻選擇在 1972 年出版了一本《柯倫泰論文與演講選集》，⁵³ 以及在 1974 年黨中央(ЦК КПСС)的授意下出版的教科書《柯倫泰》，⁵⁴「教導」蘇聯知識分子該如

52 Beatrice Farnsworth, *Aleksandra Kollontai*, p.178.

53 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ь* (Москва: Красный пролетарий, 1972).

54 Е. И. Бреслав, *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4).

何「正確地」閱讀這位女性開國元勳的著作。但是，英美聚焦更多的是柯倫泰作品內兩性關係的視角，包括在〈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所提及的婦女政策，以及她在小說中所探討關於性慾的社會問題，還有在她的政治生涯中曾經兩度站在與列寧對立面的政治立場。然而，蘇聯這兩本官方書籍的內容卻反其道而行，刻意模糊柯倫泰在1918年11月作為列寧與托洛斯基政府的反對派而且不具官方身分時所書寫的〈家庭與共產政府〉的生成背景，更有意忽略柯倫泰的小說對於兩性關係與性慾的論述。選集內挑選的大部分是柯氏呼籲大眾如何反抗沙皇、德國和白軍，並且如何推廣蘇維埃的女性勞工政策與支持黨國的愛國文章，而兩年後出版的傳記則主要依據前面選集文章的背景加以解釋。⁵⁵ 這說明了柯倫泰的「婦女問題」，從1917年10月革命後到蘇聯解體之前，往往並非純粹只是在一個時間點上柯倫泰個人的理想、理論與社會實踐的性質，這些知識的形成滲入了更多權力與政治因素的考量，是在權衡或回應國內外情勢一段時期發展後才能顯現的算計、操弄和權謀。可以更進一步地說，柯倫泰提出的「婦女問題」儘管在知識的生成中產生了異化的現象，特別是在政權不穩固、情勢動盪的時期，最終仍被嚴厲地控制在共產黨內運作的龐大國家機器和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傳播，為達集權、父權與政治功利等目的。

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男性委員們，僅在黨的重大危機產生之際與革命即將失敗之餘，將柯倫泰視為一張「神主牌」祭出，因為柯倫泰激進的思想、革命性的觀點與深具大眾魅力的演說猶如一張王牌，在號召大量婦女與青年的效用方面屢戰皆捷。利用與應用柯倫泰的這些政治策略與手腕並非僅限於蘇俄境內，在1927年中國的國共合作破局，或是在日本大肆搜捕共產黨員等事件過後——中、日兩國的共產黨正值存亡危急之秋——柯倫泰與其作品也隨之大量地被引介進兩國。於是令人好奇，她和它們在中國的命運是否也跟在蘇俄一樣，在短期內吸引著無數的婦女與青年，卻又長期地不斷被扭曲和誤解呢？1927年過

55 詳見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ь* 與 *A. M. Коллонтай*。

後，柯倫泰在中國的翻譯作品問世，文本的內外條件隨著國際情勢變化的發展遠比 1924 年列寧與 1925 年孫中山先後辭世前更為複雜，這已經超出本文討論重點的範圍，筆者擬另立專文詳述。

許慧琦在其研究中，將二〇與三〇年代走入社會的中國女性的議題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從抗婚出走到自由戀愛、從自由結婚到自由離婚，最後是實踐娜拉精神的中國女性。⁵⁶ 然而，這些階段與議題並非依據確定的年代斷然而分，而是它們之間相互牽引而互動影響，在發展過程裡前後出現的高低比例的波動問題。在五四運動初期，婚姻與其衍生議題確然比後起的戀愛問題探討得多，舉例而言，1918 年至 1920 年間，《新青年》討論兩性關係的文章多半與婚姻相關。原因之一，或如許慧琦所指，「也許女子抗婚出走的動機，不盡然只為爭取自由戀愛與結婚的機會；但不可否認，婚姻確是多數人最切身與關注之事。」⁵⁷ 然而，伴隨著出走風潮的發展，戀愛與新性道德儼然成為後續發酵且高比例探討的議題。1922 年左右，「女子的社會地位」、「戀愛」、「離婚」、「貞操」與「解放」等先前較常以個別元素做為討論的對象，已逐漸被相互聯繫成為一個對傳統道德的批判體系。茅盾在翻譯柯倫泰的文章之前，曾經將這些元素與社會現象做連結，簡易地在《民國日報·婦女評論》與《婦女雜誌》中抒發己見。⁵⁸ 從這些評論裡，可以得知茅盾與其他五四知識分子渴望尋求並建構一個新的道德體系，希冀提出一種範例，用以解決女子出走後產生了一些異化於五四運動精神與怪異的社會現象問題。

舉例而言，在〈解放與戀愛〉一文裡，茅盾批判現代中國女子的戀愛，把他在五四運動中對戀愛與解放的信仰「完全打消」，因為他發現「原來帶著狂的氣氛以求戀愛的女子，並不是為戀愛而求戀愛，卻是為

56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 190-244。

57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頁 198。

58 冰，〈解放與戀愛〉，《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 年 3 月 29 日；〈離婚與道德問題〉，《婦女雜誌》，卷 8 號 4 (1922 年 4 月 5 日)；〈戀愛與貞潔〉，《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 年 4 月 5 日。上述文章分別收入《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卷 14，頁 323-324；325-330；331-333。本論文皆採《茅盾全集》的版本。

名譽求戀愛，為出風頭而求戀愛，為金錢而求戀愛。」⁵⁹ 意即，出走的女子進入了中國社會，面對著自由風潮、青年同儕與生存問題，「戀愛」已不屬於個人私有的感覺，或個人為求獨立自主與兩性平等的要求，反而轉化成為一種進入社交場合的必經手段。茅盾續而指責，這些女子不懂真正的戀愛為何，描寫他們：

忘了求學問，忘了為社會服務，忘了做人為什麼，甚至忘了自身是什麼，但是伊們犧牲了那麼些，只為了名譽，風頭，金錢，等等外物，並不是為戀愛自身！這樣，怎能恭維伊們，說伊們懂得戀愛？那就不能說伊們已經解放！因為懂得什麼是真正戀愛，亦是解放的女子的必要條件。⁶⁰

由上可知，茅盾認為「解放的女子」必須具備真正戀愛的能力，而他所謂「真正的戀愛」的目的，包含了求學問、為社會服務、懂做人的道理，還要有自我意識，「真正戀愛」已經非關私領域的個人而已，更牽連著公領域中個人戀愛是否對社會產生用處與利益。正是在這些點上，茅盾與柯倫泰的看法相符。柯倫泰認為「性的危機」之所以產生，當中還有一個原因在封建制度與中產階級下兩性的戀愛能力貧弱，各自希望從異性身上獲得最大的精神與生理快樂，正因如此相互的掠取導致各自為孤獨的桎梏所苦。所以，「戀愛」並非屬於私領域而已，創造充滿健全喜悅的兩性關係，是勞動階級應負的重要責任之一。⁶¹

然而諷刺的是，在〈解放與戀愛〉、〈離婚與道德問題〉與〈戀愛與貞潔〉等文中，茅盾對於「解放的女子」與「真愛」兩者的定義，顯露更多的是一種來自於傳統儒家文化對於集體社會的功利主義者傾向。這些文章內文導向的不是社會變遷所出現的異化(alienation)問題的解決，而是導引出更多曖昧不明的解釋與相互「矛盾」的爭議。茅盾嘗試將「戀愛」昇華，使原本他所見的女性虛榮與利己主義轉化成為欲達各種目的——為了知識（究竟是傳統的、西方的，還是西化的？）、社會

59 〈解放與戀愛〉，《茅盾全集》，卷14，頁324。

60 〈解放與戀愛〉，《茅盾全集》，卷14，頁324。

61 А. Коллонтай,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полами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С. 155-182.

責任（父權的、婦權的，或是愛國的？）、做人的原則（傳統的，抑或進步的？），以及自我意識（主觀或客觀的？）——所做的形而上的犧牲。儘管矛盾的文本引起諸多爭議與問題，我們卻能清楚地看見「戀愛」這一主題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已經由私有的轉為公有的領域，緊密地與共產主義的預設條件相互連結。那就是，個人戀愛是否能對社會與集體產生功能和利益。如果能，方是「真正的戀愛」。

柯倫泰列出了兩個具備真正戀愛的社會學理論基礎，來解決矛盾所看到的現象與問題：一為完全的自由，一為同志生活，並建立在團結的平等與公正的關係上，一起創造社會的最大利益。⁶² 然而，這兩個條件卻有相互矛盾的嫌疑與可能性，柯倫泰提供的「完全的自由」摒除資產階級意識型態中人性的弱點：追逐名譽、風頭與金錢等外物的人並不被賦予這種自由。並非所有人都願意接受同志的生活，喜歡團結的關係，那些甘於孤獨的寂寞者，有著高度自我意識卻不願成為集體主義的「一具齒輪」，或者「一隻勤勞的蜜蜂」，難道就不懂戀愛為何物？不具有戀愛的能力？儘管矛盾與柯倫泰這些論述，以當代的眼光來看，難免淪為一種幼稚的理想，然而在對「戀愛」不明的蘇俄成立初期與五四的年代裡，卻是普及而流行的文化論調，不可忽視。

此外，1925年原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的主編章錫琛(1889-1969)，因開啓「新性道德」的討論，並批判傳統的性道德觀，而遭到總編王雲五(1888-1979)撤職。遂與其弟章錫珊自創《新女性》雜誌，並於1926年成立開明書店。就在這兩年間章錫琛主編的《新性道德討論集》儘管引起高度爭議並招致不少批評，卻仍舊一版再版。《新女性》也在1926年年初創刊，內容標榜解放女性，不少文章更直指女性情慾。這一討論空間的開設，更為1928年進入中國的柯倫泰小說與論述先行奠定了固定的讀者市場基礎。繼矛盾的翻譯之後，柯倫泰生平的介紹與創作分別在1928年《新女性》的第三十三與三十六號，以及1929年的第三十七號與三十八號再度粉墨登場、前進中國。

62 A. Коллонтай,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полами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С. 155-182.

四、文本內與外的二律背反：與父／霸權對抗還是共謀？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像是李大釗尚未成立中國共產黨或是瞿秋白尚未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之前，就已經對柯倫泰的個人生平與其著作感到十分有興趣；不但撰文介紹，在其敘述中更流露出個人嚮往之情。1918年底至1919年初間，李大釗先後於《新青年》第五與六號撰寫兩篇文章〈Bolshevism 的勝利〉與〈戰後之婦人問題〉，均提及柯氏對俄國多數黨、十月革命與全世界女性運動的功業和其重要意義，甚至將她列於列寧與托洛斯基之後。李的兩篇文章雖未提及柯氏的言論與作為，然而對李大釗而言更重要的是，女性不但可在法律的保障下具有參政權，又能獲得國內外功名和地位的這一事實，是布爾什維克黨一項了不起的成就。1921年當瞿秋白以《晨報》記者身分抵莫斯科，在4月3日的札記〈社會生活〉中，寫下他對新俄生活的冷靜觀察。時正值宣傳小冊《家庭與共產政府》出版不久，瞿簡單地記述了接待他、李宗武和俞頌華一行人的新俄政府女性官員是如何看待柯倫泰倡導的共產主義家庭政策。有趣的是，以李與瞿兩位早期中共領導人的著作為例，他們皆將現行通用的「柯倫泰」統譯為「郭冷苔」，⁶³但在論及其它著名的男性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時，除了「列寧」有統一的譯名之外，其餘如現常見的「托洛斯基」等則出現了迥異的翻譯。這一現象雖牽涉了譯文來源(source text)的發音----李從英譯、瞿順俄音，然而在翻譯「郭冷苔」這一例子上，英、俄文的發音顯然已非譯者考量的重點。不可忽視的是，譯名的統一與中國化隱含著普遍性與推廣性的意義，不但間接地說明了柯氏的知名度（1917至1922年間，柯氏在國家、民間與國際的聲望之隆，如前已述，

63 李大釗，〈Bolshevism 的勝利〉（1918年12月），《新青年》，卷5號5（1919年1月）；〈戰後之婦人問題〉（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卷6號2（1919年4月），均收入《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卷2，頁259-260，294。瞿秋白，《赤都心史》，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卷1，頁132。

超越了許多比她入黨時間更久的男性中央委員），同時，也直接地凸顯了下列幾個關於性別與霸權研究的重要問題。

首先，從李大釗與瞿秋白的著作來看，不難發現早期的男性共產黨領導人對解決中國的「婦女問題」展現出高度的興趣。女性在家庭與社會地位方面的提升，是時代汰舊換新的一個目標，亦是革命勝利與否的指標之一。李大釗在〈Bolshevism 的勝利〉中以「女傑」一詞形容柯倫泰，自然是延續了晚清民初小說對俄國與東歐女虛無黨人的旖旎想像，試圖將柯倫泰的功業與《孽海花》的夏麗雅形象和《東歐女豪傑》的蘇菲亞神話相互連結，形成一顯見的文藝與政治的遺產繼承。從女虛無黨到女共產黨，夏麗雅、蘇菲亞到「郭冷苔」的生平、主張，或是後者的著作，在中國小說或論述的文本脈絡下成爲了一種體現、一條女性追求並邁向現代性(modernity)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發展主軸。「郭冷苔」這一譯名，不僅具備現代性的新穎且中西融合的特徵，亦能符合當時中國讀者對這一主軸內俄羅斯與東歐女性形象的普遍想像；即，在美麗的女性外表包裝之下，展現出對國事熱情關心的行動與對異性卻冷若冰霜的姿態，加上行事冷靜、大膽卻細膩的心理特質。將俄國人名與中國論述結合，不但成爲一種策略，可勾勒馬克思主義急欲建構的現代「新女性」該當如何，更能利於宣傳，將思想形成一種新的、符合於新世界觀的道德觀念，在西風東漸的中國取得精神與道德上的領先與領導地位，進而逐步達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分析列寧哲學時所提的霸權(hegemony)目的——奪取領導權(leadership)。⁶⁴

然而，啓人疑竇的是，在傳播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潮流中，以男性知識分子爲主體開展的性別政策／治(policy／politics)，其宣傳對象主要是針對女性、男性，抑或是兩性的客體(objects)？不論選擇爲何，恐都難以擺脫父權制度的陰影而招致批評。另外，宣傳重點究竟是擺在知識分子，還是勞動階級的聽眾？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將引發階級矛盾與衝突的質疑。爲此，受列寧哲學啓發的葛蘭西提出「霸權」

64 請參閱 Jonathan Joseph, *Hegemony: A Realist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詹姆斯·約爾著，石智清校閱，《葛蘭西》（臺北：桂冠圖書，1992）。

理論揭示，不論是哪一性、哪一階級，其主要目的皆在使客體能被教育而轉變為媒體(agents)，在傳播的過程中發展、實踐並創造了新的意識型態領域，使其成爲一個知識的事實，然後逐步確立了某一社會集團的文化及意識型態的霸權。⁶⁵ 在奪取霸權的過程中，黨還需「將與其它社會集團合作，在某程度上尊重這些集團的利益，並對他們的要求做出讓步。」因此，「知識分子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是絕對重要，因爲奪取和保持霸權主要是教育的事情。」⁶⁶ 由此不難推測，性別與階級是爭奪霸權的兩項考量因素，而欲掌握領導權這一目的的本身或者是過程也就不免出現充滿權謀的算計。也因如此，列寧的霸權理論易於與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一段惡名昭彰的說法連結：「我們的任務不在組織革命，而在組織爲了革命的我們自己；不是製造革命，而是從中獲取利益。」⁶⁷ 深諳列寧爲人與其實用哲學的柯倫泰，不會不明白上面提及的父權現象和社會與黨內所存在的霸權機制，更不可能對於爭奪權力時所產生的矛盾與鬥爭毫無所悉，這點從她在 1914 到 1917 年間（特別是在 1916 年）與列寧夫婦頻繁的書信往來，探討黨內情勢與建言的文字之間，可以見得。⁶⁸

如果認爲身爲政治人物的柯倫泰全然只被共產黨這套霸權理論與父權機制利用來達到黨的政治目的，而且她並未因此獲得分毫的政治利益，這一說法未免過於天真。相反地，柯氏十分熟稔霸權形成的過程與機制，所選擇的位置並非處於霸／父權的體制、集團或黨之外來進行批判，而是自置於黨內，在黨內情勢與機制許可的範圍下來推動她的信念與改革。綜觀柯倫泰在《1901-1952 書信選》、⁶⁹《我的生活與工作：回

65 詹姆斯·約爾著，石智清校閱，《葛蘭西》，頁 95-111。

66 詹姆斯·約爾著，石智清校閱，《葛蘭西》，頁 107。

67 引自 Massimo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Verso, 1990), p. 21；關於早期列寧的論述與考茨基的說法，參見 Jonathan Joseph, *Hegemony*, p. 45.

68 A. M. Коллонтай, *Революция-великая мятежница: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1901-1952*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9). 詳見第 90, 109, 110, 111, 112, 114, 121, 123, 124 與 126 號書信文件。

69 A. M. Коллонтай, *Революция-великая мятежница: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1901-1952*.

憶錄與日記選集》、⁷⁰《1922-1940 柯倫泰外交官日記》，⁷¹ 柯倫泰絕不像托洛斯基一樣，意欲另立門派對抗史達林，而這些書信與日記當中也找不到隻字片語說明她想脫離或自絕於黨國之外。〈家庭與共產政府〉這一文本的形成脈絡和背景正可以做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她的政治選擇與手段，勾勒她如何在離開權力核心後，利用國內戰爭初期紅軍節節敗退、列寧的政權不穩固，還有因應全國工農婦女的需求等等的外在形勢，累積自己在民間的聲望，然後再由非官方的身分一步步地重回中央的政治舞臺，隨後當上了全世界第一個「婦女部」(женотдел)的部長。

如前已述，〈家庭與共產政府〉的內容結構與政治訴求簡明有力。有趣的是，由不具官方身分的柯倫泰來對全俄羅斯勞農婦女做出未來共產政府政策的種種承諾，這張政治支票是否生效？是否真能兌現？這顯然不是柯倫泰與布爾什維克黨所關注的重點。對前者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一藍圖是否能鼓舞勞農婦女、是否能引發後續效應，還有是否能使黨中央對她與她所提的婦女問題更加重視。對後者來說，更急迫的問題在於，「第一屆全俄羅斯工農婦女代表大會」與柯倫泰的演說是否能畫餅充飢，替黨喚回漸失的民心。此外，對德和約加深了黨內派系鬥爭的裂縫，國內戰爭紅軍失利，戰時資源極度匱乏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紅色政權的經濟封鎖等等外在條件，使得糧食問題成為婦女與家庭首要關心的議題之一。〈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既講古又論未來，對於當時現在進行式的政治情勢描述，比例相對低了許多，當然是一種給予未來希望來轉移對現實狀況的注意力的寫作策略。必須注意的是，種種外在條件匱乏、政治不明和經濟蕭條的現實情況對映著文本內勾勒的美好未來，內與外鮮明的矛盾性並不使這一文本的效用降低。相反地，這一矛盾性反而鼓舞了勞農婦女，刺激了他們回到工作崗位去參與建設的工作。

從其後的生平亦可清楚地看出，柯氏極具政治智慧，能審時度勢，

70 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дневник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4).

71 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1922-1940* (Москва: Academia, 2001), в 2-х томах.

明白如何與父權與霸權交涉、共謀和對抗，「以退為進」，進入核心後又可在黨內一次次鬥爭的邊緣與夾縫中，進進出出，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獨特性與邊緣性。隨後，史達林主義更將列寧的霸權理論推向極致，柯倫泰不但不像那些早期的男性革命先烈們一樣，在蘇維埃政權確立後霸權往極權的潮流中一一滅頂，最終還能在政治的舞臺上功成身退，這些事蹟——當然與她強調的以「新女性」作為一種身分象徵有很大的關係。

以柯倫泰為一事例，可論證霸權與極權的統治與壓制並非可以全然控制得密不通風，仍然存有夾縫，容許交涉和共謀。柯倫泰不僅成功地利用「女性」的身分為新俄羅斯政府與共產黨打響「先進」的名號、擦亮「革命」的招牌，也因此使自己的政治生涯攀上高峰，更因其著作永遠關注「婦女問題」而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代言人」的象徵。

五、結 論

由上述史實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在中國的五四時期首次登臺之後，柯倫泰與其作品藉由中蘇共黨官方建立的傳播管道，操弄並干預宣傳機制，結合五四流行文化的氛圍，柯倫泰的命運從進入中國後自始至終緊密地連結著社會發展與政治變遷，甚至是國共從合作到分裂等等大環境的外在條件變化。正因如此，在新俄羅斯與新中國建立之後，柯倫泰的作品長期以來被視為純粹政治人物的化身和體現，僅是功利主義者的宣傳工具之一，而非一個理論家呈現的烏托邦理想或文學表現形式。爾後的 1928 至 1934 年間，柯倫泰在中國與日本一如以往地扮演著她在蘇俄建國初期的先鋒隊與宣傳者的角色，在共產黨發展最艱困的時期裡，執行著婦女與青年投入共產主義與革命陣營的命令，為支持革命運動而努力。

然而，由〈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政治命運來看，儘管在許多方面顯示，柯倫泰僅只是履行來自中央委員會的任務來闡述自己對美好未來的烏托邦理想，且所遭遇的實際狀況與其信念相互矛盾衝突，但柯倫泰從來不是一個全然的服從者；她請辭中央委員會委員與社會福利部人

民委員二職，正是最佳的證明。其後，她在 1919 與 1921 年分別投入於「左翼共產黨」與「工人反對派」兩陣營，皆是反對列寧。如此理想主義的氣質與異議精神是五四時期裡中國翻譯者與讀者較少提及與注意的。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歷史需求與社會興趣反映更多的是中國男性知識分子的關注，而遠非蘇維埃女性勞工所實際面對的情景。

本文主在顯示下列幾個因素，像是原文(the source text)《家庭與共產主義》與譯文(the target text)〈未來社會之家庭〉，蘇維埃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選擇、機制和宣傳作用，兩國政治環境與社會發展，以及作者與翻譯者的目的等方面，其間的外在關係與內在作用。然而，蘇聯在 1923 年後與中國在 1927 年後的政治情況變得遠較先前複雜：大部分的中蘇傳播與宣傳管道轉入地下，雙方之間互通有無比先前更加困難，起因於 1927 年蔣介石在上海大肆搜捕與屠殺共產黨黨員。幾位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如沈端先（後廣知為夏衍，1900-1995）、楊騷(1900-1957)與周起應（後廣知為周揚，1908-1989），在 1927 年前後陸續從日本回到中國，並基於日文譯本大量翻譯了柯氏的小說與論文。柯倫泰的作品在中、日、俄三國旅行，使得在此論文中所呈現的各種因素間的關係與互動更為錯綜複雜。繼翻譯〈未來社會之家庭〉一文之後，茅盾個人命運與其創作道路也因 1927 年後中國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發展而產生演變，借鑑抑或利用柯倫泰思想，兩者之間的異同與比較值得我們另闢專文深入探討。

Transmitting and Translating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Kollontai in New Russia,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the May Fourth China before 1924

Hsiang-Yin Sasha 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Marxist feminist ideas and ideology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in New Russia,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the May Fourth China before 1924, with the specific reference to both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The first section shows how Kollontai depicts the blue print of “new women” in this text under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Lenin’s hegemony, analyzing her concep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female “self” within the future Soviet famil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Factors,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s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Communism and the Fami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ollontai’s writing motivations and Mao Dun’s translating purpo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mitting functions of Soviet propagandas and manipulating mechanisms of Chines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the May Fourth China, are all investigated in the second part.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w this work travels in the last section, I argue that Russian and Chinese male Communists usually employed the so-called “solving women’s questions” to achieve their patriarchal and political aims when they encountered serious defeat in the 1920s. Paradoxically, Kollontai, as a nonconformist and a rebellious politician, survived Tsarism, Leninism and Stalinism,

suggesting that the power of marginalization can simultaneously conspire with and against the hegemony.

Key Words: Soviet-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s, new women, *Family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he Family for the Future Society, Kollontai, Mao Dun